



RU DAO FO SANJIAO GUANXI  
JIANMING TONGSHI

# 儒道佛三教关系 简明通史

牟钟鉴/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段海宝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牟钟鉴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

ISBN 978-7-01-019106-5

I. ①儒… II. ①牟… III. ①儒家-思想史②道教史③佛教史 IV. ①B222  
②B959③B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4987 号

## 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

RU DAO FO SANJIAO GUANXI JIANMING TONGSHI

牟钟鉴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9.75

字数:58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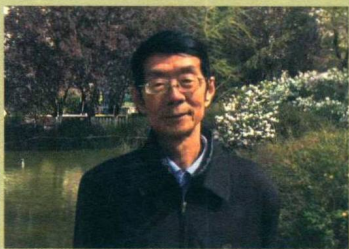
ISBN 978-7-01-019106-5 定价:10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牟钟鉴，男，1939 年出生，烟台市芝罘区人。1951—1957 年在烟台二中读书，并以烟台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1957—1965 年底，在北大哲学系攻读哲学专业本科和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冯友兰、任继愈、朱伯崑诸教授。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后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学学科学术带头人，荣誉资深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家与宗教学家。

其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主要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中国宗教与文化》《中国道教》《走近中国精神》《儒学价值的新探索》《老子新说》《涵泳儒学》《中国宗教通史》（与张践合著）、《概说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与吕大吉合著）、《宗教·文艺·民俗》《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探讨》《新仁学构想》《道家和道教论稿》《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等；多人合著有《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中国宗教纵览》《中国儒学百科全书》等；主编《中华文明史·宗教卷》（十册）、《民族宗教学导论》《道教通论》《宗教与民族》（1—6 辑）等；参与写作《中国哲学发展史》（1—4 卷，任继愈主编）、《宗教学通论》（吕大吉主编）、《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等。此外，还发表学术论文 500 多篇。主要兼职有：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山东尼山圣源书院荣誉院长等。

作为“中国文化的守望者、拓新者”，2012 年他荣获第四届孔子文化奖。《中国宗教通史》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他还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7 年 12 月 18 日，他应邀走进中南海，在第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中，就“当代世界宗教和加强我国宗教工作”主题进行了讲述。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中华文化的整体视野出发，以儒、道、佛三教关系为着力点，梳理和探讨了三教和而不同、聚同化异、互补互渗、共生共荣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两千年中华思想文化在动态中形成的基本结构，即“一、二、三、多”。“一”是儒家主导，“二”是儒道互补，“三”是儒、道、佛合流，“多”是包纳其他宗教和外来文化。作者将这种既有主体性又有开放性的文化交融之路概括为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

本书结构严密、气魄宏大，不仅填补了三教关系整体探讨缺失的学术空白，而且其提炼出来的“多元通和”模式对正确处理当下的文化关系多有裨益，真正体现了“文化自信”。

“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助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文库（乙种） 第一册

主 编 刘成有

**学术委员会**

方立天 金宜久 龚学增 张志刚 金 泽

张 践 刘成有

**编辑委员会**

宝贵贞 宫玉宽 孙悟湖 谢爱华 杨桂萍

游 斌

## 总 序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哲学宗教学文库”(甲种12册),是本校哲学与宗教学学院11位教学科研人员的一点儿奉献。任教于我校哈萨克语系的耿世民先生,因在西域宗教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其文集也一并收入本文库。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不是很大,目前只有20位专职教师;这个院(系)成立的时间也不长,1986年独立建系,2008年更名为学院。但在吕大吉、牟钟鉴、佟德富等前辈的组建和带领下,经过二十多年的砥砺磋磨,如今已经成长为中央民族大学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教学科研团队。他们秉承“进德修业”的古训,广泛吸收国内外各高校新生力量,逐渐形成了生活上随缘任运、学术上追求卓越的优良学风。此次集中出版的这批研究成果,有7种是初版,5种是再版。有些是前辈大家早年出版的重要作品,比如牟钟鉴先生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班班多杰先生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赵士林先生的《心学与美学》等,出版多年,图书市场上早已难觅踪影;有些是前辈多年研究的重要成果,比如著名的世界突厥语专家耿世民先生的《西域宗教研究》,虽然是一个文集,但主题十分集中,学术价值极高。其他8种,大多是在他们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而成的,既有对传统哲学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有对当代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现在汇编、出版这套文库的目的,主要是借此积累学术成果,表达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家园“感恩的心”。

我们这个群体,不自觉地遇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近现代的中国,置身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表现为“剧烈的社会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进一步加快,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联袂上演;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推进,难以回避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当前,如何完整、准确地表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的纠结中,能不能找到真正的“中国价值观”的标签,在推进社会保障与婚姻立法、家庭伦理建设的过程中,面对家庭本位与个体本位的艰难抉择,社会改革的“顶层设计”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剧烈的社会变革,无疑是激发思想原创的最直接动力。广泛而深刻变革的社会舞台,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可以充分施展身手的广阔天地。生活在这样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无疑是幸运的!理论工作者未必能够完全承担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但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本来就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我们这个群体,非常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温馨的大家庭里!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之所以说她“伟大”,除了勤劳勇敢、自尊自信之外,开放、包容,更能彰显出她的美德。“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共同构成了一个温馨和谐的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大家庭。中央民族大学得天独厚,是国内极少的56个民族聚集最为齐全的单位之一。在这里,无论是节日饮食,还是宗教信仰,都呈现出“多元通和”的良好氛围。民族、宗教方面的研究,也一直是这个国家级民族教育机构、“985工程”院校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的核心任务,它也始终扮演着民族、宗教等方面国家级智库的重要职能。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与现实,构成了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研究的基本对象;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也奠定了新时期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研究的基本方向。新校训“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准确、深刻地概括出了中央民族大学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办学理念。

实际上,中央民族大学高度关注民族、宗教、哲学问题的“文脉”,完全可以向前溯源到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延安民族学院,乃至蒙藏学校教学和研究的重点。诞生于1913年的蒙藏学堂(不久即更名为蒙藏学校),初办时只有中学班,后来又增设专科。增设了专科以后,说明蒙藏学校就具有了大学

的性质。在历史上,蒙藏学校不仅培养了一批民族革命干部,而且也造就了一部分了解民族宗教问题的知识精英。乌兰夫、奎璧、多松年、朱实夫、佛鼎等,都出自蒙藏学校。1941年,由于边区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独立的延安民族学院,当时担任教学和研究任务的人员有孔飞、克力更、牙含章、马寅、高鲁峰(董英)、关起义(刘元复)、海明等人。当时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等,都是极有代表性的研究民族宗教问题的力作。在蒙藏学校和延安民族学院的基础上,1951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才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深知,学术需要创新,而学术创新的不断累积,才能使学术变得更加厚重,更加具有历史的穿透力!“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哲学宗教学文库”(甲种12册)的出版,既体现着我们每个研究个体“进德修业”的具体内容,也寄托着我们这个学术团队对中央民族大学“晖光日增”的美好愿望。希望这套文库的出版,能够对新时期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发挥一点儿积极的作用。

刘成有

2012年11月于中央民族大学

附记: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哲学宗教学文库(甲种12册)陆续出版以来,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与此同时,我的同事们孜孜以求,不断推出新的科研成果,出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教学文库(乙种12册)的条件已经具备。鉴于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文库中的“985工程”一词,也就顺势替换成了“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

刘成有

2018年4月5日

## 自序

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在北大读中国哲学史研究生,对儒、道、佛三教经典有初步接触,相关观点和知识则主要来自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朱伯崑诸位先辈的讲授和著作。那时自己没有创见,却对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极大兴趣,认为是一座智慧宝库。研究生毕业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搁自己未能及时作学术研究,只是从干校回来以后读了一点书,以弥补精神的空虚。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快速发展新时期,同时也开启了学术的春天。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参加了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多卷本写作组,成为前四卷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不仅正式开始中国哲学史学术研究,而且直接承担了儒、道、佛三教斗争与融合课题的写作任务。任先生要求写作要重新从第一手资料做起,突破以往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旧框架,“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做一次严肃认真的探索”(导言)。他强调写作要重视地域性文化的差异,例如儒学出自邹鲁文化,道家和道教出自荆楚文化与燕齐文化,法家、纵横家出自三晋文化;魏晋以后,要重视儒、道、佛三教的互动与合流,从而厘清中国哲学的主要脉络。我在《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撰写了“《吕氏春秋》——秦汉哲学史的开端”与“《淮南子》——西汉道家思想的理论结晶”两章,开始探讨儒道互补。又撰写了“汉代中后期道家思想的演变和道教的产生”一章,进入道教史研究领域。在《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我撰写了“《列子》与《列子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的斗争与融合”四章,更多地关注道家、道教和三教关系,也开始探讨儒家经学。《中国哲

学发展史·隋唐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分“儒教编”、“佛教编”、“道教编”、“会通编”,在结构上体现儒、佛、道三教鼎立的思想格局,我在“儒教编”中撰写了《隋唐儒教经学》一章,按照经学史的路子往下做。这段写作前后约十年,从收集、整理、解读资料,到参照前贤研究成果,再到提炼自我独立观点、框架和表述,做得十分辛苦,但收获丰硕,日益坚信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和写作必须以儒、佛、道教关系为轴心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我参加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学术活动,90 年代中期以后又成为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成员,这促使我进一步研究儒学,其成果集为《儒学价值的新探索》(齐鲁书社 2001 年版)。80 年代末我转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在教学与科研及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中陆续发表了一批关于儒家人物与经学、儒学的义理与当代、儒学的兴衰与未来的研究文章,后来集为《涵泳儒学》一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我很认同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的理念,深感时代需要儒学、儒学需要创新,于是近年写了一本《新仁学构想》(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用以寄托自己“仁以为己任”的文化理想,也祈望“明体而达用”,对社会精神生活有所改良。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我的学术研究另一个主设方向是中国宗教史,其中包括道教史。我虽然不认为儒学是宗教,而是东方伦理型人学,然而肯定它有宗教性,它所推崇的礼文化中的敬天法祖则是中国人普遍持有的基础性信仰,而且儒学对于佛道二教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与张践教授合写的《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中,就叙述了儒、道、佛三教互动的历史过程。为了给学生开设经典阅读课,我在研究《论语》、《孟子》的同时,花大气力研读《老子》,用七八年时间形成八十一章疏解,加上相关文献考证与义理阐释,遂成为一部《老子新说》(金城出版社 2009 年版)。同时,我由研究道家进入研究道教史,撰写了《中国道教》(广东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1996 年版)。21 世纪初我与山东学者一起进行调研,结合文献资料,写成《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齐鲁书社 2005 年版),梳理了全真道从山东兴起并走向全国的历史,有益于深入了解道教后期的发展,也更能认识三教合流对于道教义理的转型的作用。我与中国道教学院、香港青松观道教学院及

台湾道教界保持友好往来,这使我能在书本以外的实际生活中去体验道教的人物、仪式、组织活动、生存方式、对现代生活的调适及存在的问题。2014年11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道家和道教论稿》,把多年积累的道文化专题系列论文汇集成册,包括:老庄与道家,大道论,道家与道教同异论,道教的历史、义理、人物和道教研究与转型。由此对于儒道两家文化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

在儒、道、佛三教关系中,我首先关注的是儒道互补。1991年12月,我参加香港法住学会举办的“安身立命与东西文化国际研讨会”,提供的论文是《安身立命与儒道互补》。后来又写了《论儒道互补》(与韩国林秀茂教授合写,1998年)、《儒道互补与治国之道》(2001年)。在我心目中,儒道互补不单是中华思想文化的主脉和底色,对我个人而言,也逐渐成为我的自觉的人生哲学,与我的精神生命融为一体了。换句话说,孔子儒学给了我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把“修己以安人”作为生命价值所在;老子道家给了我自我意识和心灵自由,把“返璞归真”作为保持生命真我的智慧。

在儒、道、佛三教中,我对佛教的了解是最浅的。佛学号称难治,学者视为畏途。我没有系统接受过佛学的训练,主观上也未曾打算长期深入其中,因为时间和精力已用于儒道,无法再分身了。但是为了研究三教关系并给中央民族大学同学讲课,我不得不适当读点佛经和相关研究著作,以便对佛教有所了解。我读了若干佛典,如《心经》、《般若经》、《金刚经》、《法华经》、《华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肇论》、《坛经》、《弘明集》、《广弘明集》等;又读了若干佛学研究作品,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多卷本、郭朋《中国佛教史》多卷本、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和《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等。由此我对佛学略知一二,其中汤用彤、郭朋、方立天的著作最使我受益。我尝试写了《鸠摩罗什与姚兴》、《禅的真精神与平民性》、《从赵朴老的若干诗词看人间佛教的真精神》、《两方净土 三位弥勒》等几篇文章。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我开始发表论三教关系的文章。如《魏晋南北

朝时期上层集团对儒、释、道三教的认识与政策》(1986年)、《从儒佛关系看韩愈、柳宗元与李翱》(1993年)、《从中西文化比较中看儒释道》(1997年)、《儒、佛、道三教的结构与互补》(2003年)、《儒、佛、道三教关系与文化简论》(2004年)、《人文与宗教的互补——儒释道融合的重要经验》(2014年)、《儒释道与人生观》(2014年)。这些文章的共同点是提纲式的简短,或专注于某一时段,都未能充分展开。

与此同时,在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后升格为学院),我给研究生讲“儒、道、佛三教关系”,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逐步形成一份约四万字的讲课纲要,要点有:研究三教关系的重要性、三教各自的精义、三教关系历史阶段、三教同异、三教冲突论、三教融合论、三教合流表现、三教合流与中华文化。

我为什么把“儒、道、佛三教关系”讲课纲要一度搁置,而现在又想扩充成为一本专著呢?除了学术研究主题随时转移的缘故,还由于心理上的矛盾及其破解。毫无疑问,“儒、道、佛三教关系及历史”这个题目太大太难,以一个人的有限生命不仅无法透彻掌握三教文化的历史与理论,就是毕生精力也难以通晓其中一家,这就是庄子发现的认知悖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我虽然在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研究中对三教关系问题有一定思考和积累,但一想到三教文化之博大精深,便觉得自己不过是在那片浩渺无边的思想海洋的一角涵游,怎么能够兼综三教而论之呢?因此,我总觉得自己的“儒、佛、道三教关系纲要”的知识基础不够,不愿整理成书。可是三教之间相融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内部和而不同,聚同化异,互补互渗,共生共荣,若不对三教皆有所知,则一教亦无由真知,各家不同时期学派、人物亦复如是。研究三教关系与研究一教互为前提。要破解这个矛盾,只有两者同时进行,在动态中逐步化解。学者的研究大都侧重三教之一,或者一教中某一专题,但必须对其他二教宗旨、经典、人物有基本了解,这个要求是可以也应当做到的。对于青年学子而言,在接受国学知识训练的时候,能够对儒、道、佛三教的要义与相互关系有常识性的了解,以便开阔视野,在三教比较中进入中国思想史核心领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近来我决定对“儒、道、佛三教关系”纲要

加以扩展和调整,希望形成一本内容尚属实在又简明扼要、条理力求清晰而层次分明、文字能够信达并通俗的书,主要供青年学生参考。我不是完美主义者,我甚至认为完美主义出不了学说,凡具创造性的学说皆有所得又有所失,只不过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不能胡乱标新立异。至于篇幅之简繁,则各有所用;鸿篇巨制固然可以为学术研究开路立碑,而雅俗共赏的中等篇幅的专著,亦能同时为学术探讨和文化普及加油助力,我希望自己的书能够属于后者。

在纲要形成和扩写过程中,我参考了许多先辈和时贤的研究成果。老学者中比较重要的有:冯友兰先生的“三史”、“六书”,特别是其中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新原道》;李养正先生的《道教概说》和《道教义理综论》;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郭朋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多卷本。在写作中粗阅了近些年出版的洪修平教授的《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和张文勋教授的《儒道佛美学思想源流》,增长了见识。我把拙作定名为“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在顺序上依次为儒、道、佛,是因为先有孔、老而后再有佛教传入;又标出是“三教关系简明通史”,意在说明此书重点在三教互动的关系史而且从它的史前史通到民国时期及其延续,内容上是简明的。为此本书除了论述三教之间发生的争辩、冲突和各种融合理论外,还要对三教文化各自的演变脉络和主要人物、思想及其中三教综合要素加以考察,梳理三教互动的阶段性特征,勾勒三教关系历史的大致轮廓,而在知识量上难免挂一漏万。对于三教文化在东亚和海外的关系史,基本上不予涉及。只要此书在结构、观点和表述上有可取之处,又能够为世人领略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中国经验提供帮助,我就满足了。

# 目 录

自 序 .....	1
<b>第一章 总论</b> .....	1
第一节 研究儒、道、佛三教关系的重要性 .....	1
第二节 儒、道、佛三教内在结构的多元互补性 .....	3
第三节 儒、道、佛三教的主要内涵与精神 .....	6
一、儒家 .....	6
二、道家 .....	13
三、佛家 .....	22
<b>第二章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儒道关系史</b> .....	29
第一节 中华文明多元通和传统的早期形成 .....	29
第二节 孔老并生、儒道互补构成中华精神发展的轴线 .....	32
一、孔子是中华德文化承前启后的道德大师 .....	32
二、老子是开拓中华文化深层哲学思维的智慧大师 .....	39
第三节 战国后期儒道两家的互评与对先秦文化的总结 .....	56
一、儒家荀子的总结 .....	56
二、道家《吕氏春秋》的总结 .....	60
第四节 两汉时期中华思想文化的综合发展 .....	67
一、道家思想的实践与发展 .....	67
二、儒家思想的实践与发展 .....	78

三、两汉时期儒道关系史小结 .....	101
<b>第三章 儒、道、佛三教关系发生阶段(汉末时期)</b> .....	103
第一节 东汉人将佛陀视为神仙 .....	103
第二节 汉末佛教渐具规模 .....	105
第三节 牟子《理惑论》与三教碰撞的正式发生 .....	105
<b>第四章 儒、道、佛三教互动并在论争中求同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b> .....	110
第一节 儒家经学的分化与创新 .....	110
一、魏晋玄学经学 .....	111
二、魏晋南北朝经学的理性化、多样化 .....	112
第二节 新道家玄学的兴盛与道教的壮大 .....	116
一、玄学引领学术潮流 .....	116
二、道教的壮大 .....	128
第三节 佛教的崛起与融会发展 .....	140
一、佛经翻译与东传规模的扩大 .....	140
二、佛教信仰扩展到社会上层和多民族地区 .....	144
三、中华高僧大德相继问世 .....	147
第四节 儒、道、佛三教之间的论争与融合 .....	154
一、东晋时期儒佛的论争与佛家走近儒家 .....	155
二、刘宋时期三教之间的几场大辩论 .....	159
三、齐梁时期三教争论走向高潮和学理的深入探讨 .....	169
四、二武灭佛的极端事件 .....	181
五、三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历史意义 .....	184
<b>第五章 儒、道、佛三教鼎立具全国规模并成为常制阶段(隋唐时期)</b> .....	194
第一节 儒家经学的一体化、制度化和经世致用 .....	194